

文化的符号意义

——再评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

刘 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学部 北京 100024)

摘 要: 本文从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出发, 首先界定了文化符号学的研究领域, 然后探讨了塔图学派模型中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并将此模型与其他的交际模型进行了对比研究, 指出了模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 作者将模型中的一些观念引入到文化与性别关系的课题讨论当中, 指出了性别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前景。

关键词: 文化符号学; 塔图模型; 文化; 文本; 性别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2007)10-0011-07

Cultural Semiotics and Its Significance

——Revisiting the Cultural Semiotics of Tatu School

Liu Hui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cultural semiotics, first confirms the research domain of it and then explicates some conceptu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atu model, comparing it with some other communication models with some problems figured out. Finally,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of Tatu model into gender studies, putting forth the feasibility and future of the study on culture semiotics of gender.

Key words: cultural semiotics; Tatu model; culture; text; gender

文化符号学的概念是由塔图学派首先提出的。从索绪尔提出符号学的概念起, 符号学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并由普通意义上的符号学研究进入了更细致、更深入的层次, 文化符号学正是在这股研究潮流中应运而生的。文化符号学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研究一种文化内所有的符号体系, 这有些类似于体系的列举; 二是研究用于组织存在于一种文化内具有个性化的符号体系的规则机制, 从这一点看, 文化符号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符号的生命与社会意义上, 因为无论文化是什么, 也无论探究的是其无限意义中的哪一个方面, 文化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学的重心在于符号的应用, 而不仅仅是符号的分类。

一、文化符号学研究领域的界定

尽管许多学者都曾使用符号学的观点去分析文化, 像美国、加拿大的人类学家 Milton Singer、Irene Portis Winner、Erik Schwimmer, 以及德国的符号学家 Roland Posner、Walter Koch、Ivan Bystrina 等, 但他们由于方法论的关系并未能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符号学的视角进行研究。人类学家从事的仍然是人类学的研究, 其借鉴的符号学理论也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而非真正文化范畴的理论; 即使是采用了源于文化符号学的概念, 其使用也只局限于整体框架中的某一部分, 而不能得到系统的应用。Bystrina 感兴趣的是大众传媒, 遵从的是社会学的传统。在 Koch 的研究中, 虽

[作者简介] 刘辉(1977~), 女, 江苏南京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部讲师, 硕士。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语言与文化、跨文化交际。

然关注了不同符号学体系间的关系, 但其在有关文化与自然对比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更接近于人类学。在以上所提及的学者中, 只有 Posner 试图将其研究建立在塔图学派的基础之上, 他所使用的符号学概念中包含了塔图学派的概念, 但是他最根本的兴趣还是在于使用基本的符号学概念去重建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由此可见, 学者们对于文化符号学研究领域的界定还是相当模糊的, 如果想使文化符号学得到深入的发展, 那么确定文化符号学的研究范畴对于使用正确的方法从事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 我们需要确定文化符号学究竟是关于什么的一门学科。文化符号学探讨的是某种文化内部的成员所持有的关于其自身文化的模型。因此, 它涉及不同文化间的相似及相异之处的对比, 也包含了不同文化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这就引出了一些相关的课题, 如同一文化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似之处及关系 (如艺术与其他文化领域之间, 外来人口文化与本土人口文化之间等) 这里受到关注的是文化模型, 而不是文化本身, 因此文化符号学的研究也涉及一些文化概念的问题, 如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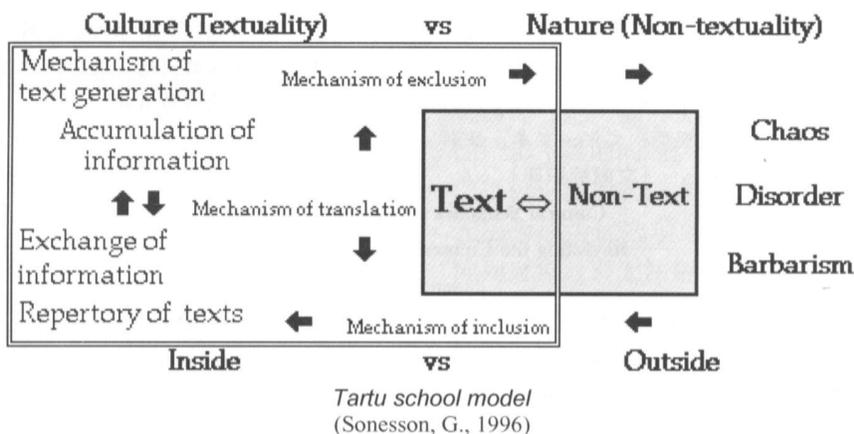


图 1

二、几个概念

1. 文化

文化的定义极其复杂, 那么文化语言学中的文化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呢? 塔图学派所构想的文化是对立于自然的一个概念, 其存在是以自然的存在为前提的。塔图模型 (见图 1) 就是围绕着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而建立起来的, 其构建沿袭了传统的结构主义的模式, 文化与自然二者互相定义对方, 但就此模型本身而言却并不那么对称, 自然的观念是依文化的观点而定, 但反其道却不尽然。塔图学派声称, 每一种文化都将其自身看作是秩序的, 并不自觉地与那些被认为是混乱的、无序的东西对立起来, 即文化对立于自然。据此意义而言, 自然也就包含了此种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这种观念确实存在于绝大多数的传统文化中, 有些文化甚至通过语言直接表达了出来。在墨西哥语中仍然保留着一些残存的玛雅语

(huesteco), 其中表示“人类”的词与“操本族语者”是同一词汇。对于希腊人而言, 野蛮人就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 他们只会发出没有任何意义的声响。在另外一些文化中, 可能语言中并没有此种反映, 但这种观念却可能被表现为保留至今的种族歧视, 或者更普遍地表现为对于外来人口或事物的畏惧与憎恶心理。当然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一种文化也会将其自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 代表了无序与混乱, 持有的是对自身的否定态度, 而同时另一社会则扮演着文化的角色, 例如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尚美之风, 就是把美国当成了文化的代表, 而将自己的文化隐没于自然的混沌之中。当然, 文化的定义都只是相对而言的, 在不同的方向和领域可能会有不同的取向。中国人在历史、艺术方面会认为他们更具文化性, 而在科学、娱乐方面也会承认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优越性。

一般而言, 塔图学派概念中的文化与非文化

的区分是以国家为界的,但从广义而言,这种区分也可以存在于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因此,塔图学派模型更关注的是文化间或亚文化间的关系,而并不是文化本身。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在一种文化之外、与此文化相关的或相离的事物之间的区分,也就是超文化 (extra-culture) 和非文化 (non-culture) 的界限,以及在文化内部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对比。超文化是指较难理解的文化,而非文化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一个文本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就是经历由非文化到超文化到边缘文化,最终成为中心文化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此文本从杂乱的状态逐渐变得有组织、有秩序,从而更加有意义。这样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变化是存在的,但有时也会因为一些因素的干扰而导致此连续体的断裂,非文化可能直接转变为文化中心文化。

文化符号学中的文化是该文化成员观念中的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型。这里我们可以将文化认同于自我,虽然通常意义上只是一种集体的自我。这使我们想起了其可能的哲学渊源,黑格尔与萨特哲学中“我 (ego)”与“他者 (alter)”的相对论,或者更确切的是巴赫金的对话 (dialogicity) 模型。

相对于文化,自然的观念就十分模糊了,它既不是自然科学中所设想的物质世界,也不是风景画中所描绘的风光景致,其基本的概念就是非文化范畴事物的总和,并因为没有组织性而不可理解和掌握,当然人们也并不真正想掌握和理解它,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并没有赋予它一定的价值。

2. 文本

在众多字典中对于文本的定义几乎都是将其限制在语言文字的范畴之内,并将其与非语言系统对立起来,但文本的概念是否真的如此狭隘呢?尤其是在大文化体系之中来研究文本概念的时候,文本的定义显然并不局限于语言领域。

关于文本有很多学者都下过定义,由于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定义也复杂纷呈。Lotman (1966) 认为,文本是离散的信息,它可以被明确地看作不同于某一“非文本”或“其他文本”。一个文本有开端、结尾、确定的内部组织,而并不是一堆混乱符号的堆积。按此定义,每一

文本内均有其固定的内部结构,因此文本是一个具有组织性、结构性、等级性的构建。Barthes (1965) 认为,文本是对立于运作的生产率,可以通过重新分配资源来改变信息。Bakhtin (1986: 103) 则认为文本是人类科学中最重要的数据,是直接的现实 (思想的和经验的),在其内部思想和经验可以自我构建。

文本是塔图学派模型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文化中可被理解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据此,文本不可存在于文化之外,但并不排斥非文本从文化外部进入文化内部从而转化成文本。非文本被文化内部的“排除机制”拒之门外,却又被“包容机制”接收。在一定时间内,众多非文本素材的堆积会导致产生新的理解机制,使其本身在文化范畴内有可能被理解,甚至还可能导致产生一个新的产出机制,允许文化创造出原来只存在于文化之外的文本。整个现代主义的历史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非文本转化成文本的过程,将原来视为不入流的非艺术转化成真正的艺术,而原来所谓真正的艺术又被孤立出艺术的领域。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文化符号学派一个重要人物 Posner 关于文本的一些理念。Posner (1989) 将普通语言意义上的文本到文化符号学意义上的文本概括为 3 个层次:从书面文字到口头表达,从口头表达一系列经过解码的符号,从一系列经过解码的符号到任一经过解码的符号。这有些类似于 Lotman (1986: 22) 对于广义符号学世界的划分:(1) 天然语言的第一模式系统;(2) 交通信号等人工语言系统;(3) 在天然语言层上建立的文化通讯结构——第二“语言”或第二模式系统。

下面将进一步探讨 Posner 的划分理论。第一个阶段是从书面文字到口头表达。任何持续性或瞬间的语言表达,只要其内容是由符号决定的,都可以被看作是文本。根据 Posner 的定义,符号应当被看作连接内容和形式的一种天然关系。这一层次的概括是最普遍也是最直接的。Halliday & Hasan (1976) 有关的理论研究也就到此为止。Bakhtin (1986) 尽管在后来也提到“隐蔽性的文本”也可以音乐、美术的形式出现,但并没有做出更深入的探讨。第二层次的概括是将我们从语言的层面带到了一系列经过解码的符号。这一层次的文本包括了交通信号,例如“前方道路施

工”这样一块标牌可以提醒司机减速或绕道而行。然而 Mounin (1970) 认为一些交通信号并不具备符号的特征, 因为它们不能形成任何序列。对 Posner 的观点有一点值得推敲的是, 符号之间的连续性是由内容而非形式决定的。文本的本质是一个语义单位, 而非其他。第三层次的概括放弃了序列的概念, 即任意经过解码的符号, 即使不能形成一个序列, 也可被称作文本, 因此, 文本似乎就是任何与原型 (type) 相关的可以再生的型例 (token)。这里 Posner 是参考了 Goodman 的有关理论 (自书艺术与代书艺术的对比研究), 但却并没有发展这一观点。

Posner 有关文本层次的分析是启人深思的, 但与塔图学派模型中的所定义的文本概念还是有出入的。塔图学派的文本概念在内容上更加丰富一些。事实上, Posner 后来也将此富有更广泛意义的文本概念应用于将文化与非文化的对比同化为符号化与非符号化的对比研究当中。

三、塔图模型与交际模型之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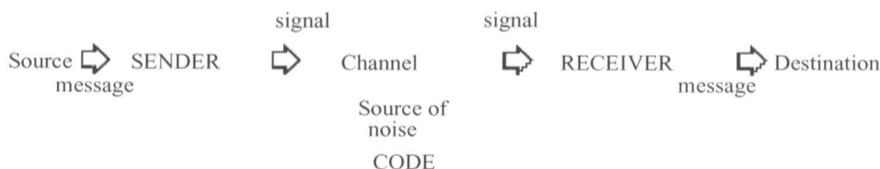
由于符号学深受信息论和控制论的影响, 至今几乎所有的符号学理论的构建都依赖源自信息数学理论的通讯模型 (见图 2), 该模型广泛被用于描述通信、电报、广播等方面的技术方法, 并弥补其在传输过程中的信息缺失。因为 Jakobson (1960) 和 Eco (1976) 的广泛影响力, 这一模型被当作所有交际、意义的模型运用于整个符号学领域。

但这种广泛的应用却产生了两个对称而消极的结果: 一是把指号过程 (semiosis) 转化成大众传媒的方式, 特别是广播、电报所使用的方式, 这使我们对方式较为直接的交际已经不太理解, 并且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指号过程, 也使我们不可能去理解由于采取不同的技巧而附加于直接交流上的复杂性。信息通讯模型作为意义产生的一个普遍性的描述或是作为交际特殊方式的关系, 其缺点是显而易见的。

1. 交际的空间性

对信息通讯模型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其空间性的概念。它将交际类比为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 意义的解释就如同物体从一地移动至另一地。然而, 空间性在典型的媒介中却并没有其特殊重大的意义, 就像电报、广播, 当电报或广播运作传输时, 的确有某种物质在空间移动, 但对人们而言这最终是无形而不可得的, 因为除了开始和结束的两端, 并不存在任何的空间影射。空间性的主导地位更容易从像信件这样的媒介中获得解释, 因为信件通常需要通过邮递员、邮车或火车、飞机等进行空间的运动转移。

将交际等同于交通可能是由于图表表达方式的局限性所致, 而不是媒介本身的原因, 或者正如 Reddy (1979) 有关“渠道隐喻”的分析所说, 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由。有趣的是, 早在 1929 年, Volocinov (1986) 就批判了信息通讯模型, 远远早于其被用于构建通信数学理论, 但是 Levi-Strauss 还是将此模型作为其循环平行论的基础。



Model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Sonesson, G., 1996)

图 2

“一个信息从空间中的一点移动至另一点”的观点忽略了一个现实, 即在许多情况下, 一些交际可以采取移动的方式完成, 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完成。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交替构成了区分不同媒介的主要因素之一。以前, 发送者还必须去邮局发

电报, 但现在他可以通过电脑网络来完成。接收者如果不选择使用影碟机还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有时候接收者还必须进行持续的移动行为, 例如某人在展览馆里欣赏艺术品。接收者的主动性在布拉格学派的符号学模型 (见图 3) 中得到了说明。布拉

格学派对有关在交际发生前被传导物体的具体化的概念展开了讨论, 但是并没有详细说明参与者的活动程度, 更没有提到其本质。当然, 活动只是其形态之一。重要的是, 即使在信息通讯模型中, 这一性质也不能总是准确无误地归因于信息, 而可能与交际行为的一些情形更加相符。更重要的是, 即使

信息被空间代替, 接收者和发送者还是需要发挥主动性。另一个指向接受者在交际中主动作用的理论就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话似乎通常所指的是一种行为, 但奇怪的是在巴赫金自己的著作中, 对话几乎没有意指行为, 或即使在意指时也只是非常片面化的一个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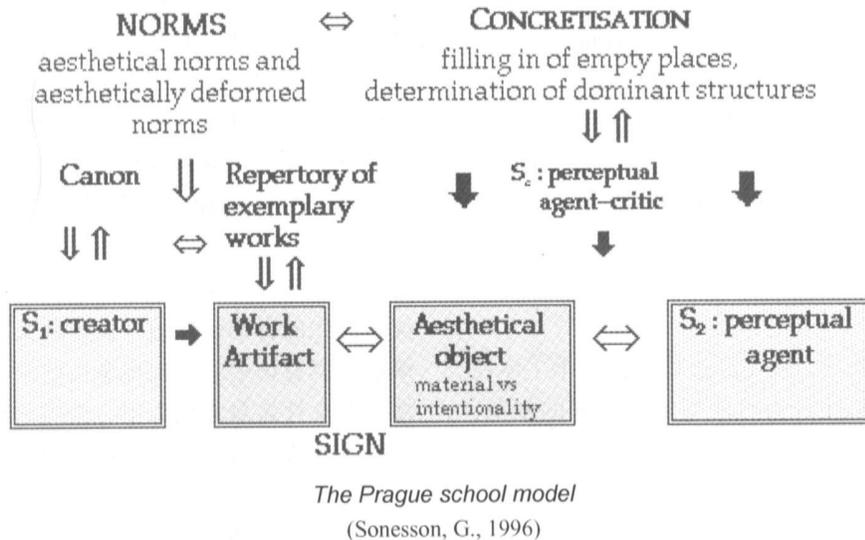


图3

另一个在交际中可以发挥主动作用的就是代码。这在塔图学派模型中变得更为具体。文本变成另一文化中非文本, 当一个代码被重建的时候逐渐转化成文本。

2. 交际的时间性

塔图模型主要研究交际障碍, 而布拉格学派考虑的则是成功交际的可能性, 将接受者视为交际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同时, 塔图学派只重视不同空间分布的实体, 而布拉格学派则将重点放在同一文化不同时间段之间的关系。

正如 Mukarovsky、Vodicka 等研究所说明的那样, 规范一方面从属于审美的意义范畴, 另一方面又超越了美学的界限。它作为一个准则, 或一套规则, 以可供模仿的艺术作品的形式, 决定了其他艺术品的产生。为了成为一件可供审美的作品, 这一艺术品必须供艺术大众来鉴赏, 而这一被称作定性化的鉴赏过程依存于规范的存在。一般而言, 此规范与作者的个人规范是相符的。然而有趣的是, 规范可能在此艺术品产生后被修改或转换成其他的规范了,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此艺术品新的理解和解释又将产生。定性化的过程

涉及了处于艺术作品结构中主导者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所谓主导者就是承接重点并负责组织结构中其他剩余元素的因素。定性化过程也允许接收者以自身经验来填补一些缺失的细节。

这一模型是对于胡塞尔现象学中感知概念的一个补充, 增添了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使这一模型具有普遍意义, 并在将其运用于感知性事物时保持其社会特征。在这种意义上, 任何供感知的艺术品的生产都具有不同概括性程度的规范, 其定性化的过程也是如此。

根据 Mukarovsky 的观点, 规范的约束力在一些情况下会有规律性的制约力量, 但有时却只是具有简单建设性意见的东西。也许我们还可以再深入一些, 在 Pierce 和 Husserl 看来, 规范可能仅仅是一个被遵守的规则或习惯, 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的常规, 因此我们又回到描述那些被想当然的所有可能的文化核心的常态科学研究上来, 如 Gibson 的“生态物理学”, 或者超越其上的 Husserl 的生命世界 (life world)。

然而, 在信息通讯模型中也得到反映的时间性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和仔细的研究: 发送者和

接受者所施行的是时间性的行为,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虽相近却并不重合。这对电报来说是正确的,却并不适用于日常的面对面的交流,对于像音乐和电影这样必须在被接收前就被创造出来的媒介也不适用。信息通讯模型忽略了信息时代所带来的那些变化,因为甚至图画也成了瞬间行为,像电视图像或网络图片等等。交际应该被看作是两套行为,而不仅仅是有主体引起的、影响客体的一个连续性过程。交际是同时由两个主体——发送者和接收者引起的,可能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中发生,但通常都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应该能清楚地感觉到交际的发生确实需要两个参与者,当我们接受电子邮件的时候,必须将我们的电脑与服务器相连接,否则就不可能成功地完成这一行为。

布拉格学派认为在交际过程中的两个主体在开始他们的时间性行为时使用的是不同的规范;塔图学派则认为两个主体在开始其空间性行为时使用了不同的文化系统。这意味着接收者所持有的意义并不一定就是发送者所持有的。以“渠道隐喻”来说,也就是进去的不等于出来的。这一理论也受到了批判,Volocinov (1986)认为意义从一个主体传送给另一个主体的过程应该总是处于变化的状态中。Lotman (1988)则考虑了同时存在的两种模型,而不是一种。第一种是传统的交际模型,其过程中意义保持不变;另一种则类似于一种思想产生机制,意义趋向于生长,并最终产生新的意义。两种模型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存在,但其中一种在一定的行为领域和时期内占主导地位。Wertsh (1991)将第二种模型等同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但认为“接收者可以完全不考虑发送者的本来意义”却是一种歪曲的理解。

四、性别、文化、符号

从文化符号学,尤其是塔图模型的观点来看社会中存在的有区分的男性文化、女性文化以及性别歧视现象,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既然文化是一个文化内人群所共同持有的文化模型,并且具有自我性和排他性,视非己文化为非文化,那么虽然男性文化和女性文化之间的对立只是大文化范畴内的亚文化间的对立关系,但若从较广的意义上来看,仍相似于文化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这也正是造成性别歧视现象的根源。

男女由于性别生理上的差异及历史社会方面的原因,各自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和价值体系的文化,其在内涵上虽然有重合之处,但差别还是主要方面。由于长期形成的男性在社会、家庭中的主导作用,及男性强有力的自我意识,在男性世界中,男性文化是作为文化模版存在的,它代表了秩序和权威,一切与之相悖的,尤其是与之相对的女性文化,都被视为是无序的、混乱的。男性坚强有力的性格成为遵守的规则,而女性柔弱感性的一面则遭到贬斥。由于从男性视觉的产物——男性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女性,女性文化中与之不符的特征和属性都被当成了非文化的因素,文化主流决定价值观。另一方面,从女性自身的角度来看,很多女性由于长期受到传统男性优势文化的影响,导致女性人群文化自我意识的淡漠,其意识中的文化概念被改变,由原来本应持有的女性自身文化为中心的模型转化成以男性文化为中心的模型,这样就与男性人群所持有的文化模型相一致,在全体人群中形成统一的文化模型,并且这些女性已成为男性文化范畴内的成员。这说明歧视女性现象的形成不仅是男性自我意识膨胀的结果,同时也是女性自我意识消退的产物。

当然,这也并不排斥女性文化文本经过转化成为男性文化文本而被接受和认可。例如,本来只有在女性服饰中才得以应用的色彩、款式、剪裁,曾被男性拒之门外,并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是轻浮、夸张、繁杂的东西,如今已被诸多设计师使用到男性服饰的制作中来。服饰文化中女性元素的增加正说明了女性文化文本对男性文化的渗透性,即两性文化的可转化性。

由于文化的复杂性,男女两性的关系也不能仅仅被定义为主导与从属的关系,崛起于20世纪中叶的女权主义运动正是对这一文化模型的挑战。由于历史、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迁和发展,一些女性逐渐意识到男性文化施加于她们之上的强制力和不公正待遇,从而摒弃男性文化的枷锁,并重新恢复了女性文化在她们意识中的主导作用。这样持有不同文化观念的群体之间的矛盾就难以避免了。女权主义者试图将各种评价体系纳入女性文化范畴的轨道,以女性的文化文本作为规范,而同时男性与一部分女性则竭力维系原有的文化模型。非文化文本素材的堆积会导致

非文化转变为文化,这是非主流成为主流的过程。然而男女两性文化对立的状况并不与此完全相符,男女两性在将各自文化视为文化,而将对立面视为非文化,可以说是两股主流的抗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文化逐渐由弱势走向力量均衡的状态,一些歧视女性现象的消失就是有力的证明,但同时一些现象仍然存在,并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由文化的稳定性所决定的。

以上是从塔图学派模型的观点对男女文化的对立及性别歧视现象进行的一些粗浅的探讨,其中一些方面还可以做出更深入的研究,如差别、联系、转换以及其中的结构、组织和趋势等等。

文化符号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日趋成熟,从倚重普通符号学理论的阶段到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我们研究文化符号学就是想从文化组合段的结构、语义内容、信息交流行为和外在生活环境等方面来涉猎环境下的文化指物编码,最终确定指称对象所包含的内容和外在形式,达到超话语交流的效果。文化符号研究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以至世界上的文化强国无不竞相研究文化符号科学。由于文化符号学涉及的研究面极其广泛,所以其发展前景是十分看好的,但同时也要防止研究的泛化,从而导致研究流于分析文化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了文化的符号结构性。总之,文化符号学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其研究符合时代的要求,并将向纵深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Bakhtin, M. M.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M].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1986.
- [2] Barthes R *Le Degré Zero De L'écriture/Élément de Sémiologie* [M]. Paris: Gonthier, 1965.
- [3] Eco, U *A theory of semiotics*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4] Goodman, N. *Languages of Art*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5]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1976.
- [6] Jakobson, R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A], in: Sebeok Thomas, (ed.), *Style in Language* [C].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60. 350~377.
- [7] Koch, Walter, utg. *The Nature of Culture* [M]. Bauchum Brochmeyer, 1989; 240~295.
- [8] Lévi-Strauss. *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 [M]. Paris: Plon, 1958.
- [9] Lotman, J. M. *Struktur Literarischer Texte* [M], W. Fınd 1986.
- [10] Mounin, Georges. *Introduction à la Sémiologie* [M]. Minuit, Paris, 1970.
- [11] Mukarovsky, Jan. *Studien zur Strukturalistischen Ästhetik und Poetik*. München [M]. Hanser Verlag, 1974.
- [12] Mukarovsky, J., *Aesthetic Function, Norm, and Value as Social Facts*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0.
- [13] Posner, R., What Is Culture? Toward a Semiotic Explan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concepts [A]. In *The Nature of Culture* [C]. Koch, Walter (ed.), Bochum: Brochmeyer, 1989; 240~295.
- [14] Reddy, M. J. The Conduit Metaphor [A].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C]. Ortony, A.,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15] Sonesson, G. *From Rhetoric to Semiotics by Way of Ecological Physics* [M]. Semiotica 1996.
- [16] Wertsch, James V. *Voices of the Mind: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Mediated Acti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7] Volocinov, Valentin Nikolaevic.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6.